

评戊戌维新中的谭嗣同

萧致治 刘振华

作者 萧致治,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武汉, 430072

刘振华, 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武汉, 430072

关键词 戊戌维新 谭嗣同

提要 谭嗣同是百年前戊戌维新中的著名人物。他以大无畏的革新精神, 向存在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君主专制的纲常名教发动了猛烈的批判, 对清朝统治者的种种罪恶进行了大胆的揭露, 同时冲破重重阻力, 推行变法维新, 最后为变法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整整 100 年以前, 帝国主义在华掀起“瓜分狂潮”, 亡国灭种的警报, 震撼中国大地。为了救亡图存, 以康有为为首的爱国志士, 发动了一场伟大的政治革新运动——戊戌变法。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谭嗣同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 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思想之激进, 行动之勇毅, 受到人们一致赞扬。值此变法 100 年之际, 特撰此文, 以资纪念。

一、冲破旧思想、旧传统的闯将

戊戌变法是一次伟大政治运动, 也是一次著名思想解放运动。由于封建统治延续几千年, 维护君主专制的思想根深柢固。不打破这种思想桎梏, 政治变革寸步难行。因而, 从维新变法一开始,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就纷纷办报刊, 著书撰文, 对封建思想展开批判, 积极宣传变法维新。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 冲击封建思想最猛烈的是谭嗣同。梁启超称谭的《仁学》, “区区一卷, 吐万丈光芒”, 有如思想界的“慧星”^①。谭嗣同指出, 封建思想、习俗无孔不入, 浸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网罗重重, 与虚空而无极”, 因而强烈呼吁要冲决一切网罗, “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 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 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 次冲决君主之网罗, 次冲决伦常之网罗, 次冲决天之网罗, 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 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②在这八大网罗中, 最紧要的是冲决君主之网罗和伦常之网罗。

君主专制是秦汉以来中国唯一的统治方式, 它给历代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两千年中, 历代统治者为维护君主专制统治, 竭力将君权神化, 大肆散布“君权神授”谬论, 借以愚弄广大人民, 以致在人们的心目中, 皇帝是统治万民的天子, 神圣不可侵犯。谁反对皇帝, 谁

就是“叛逆”，是乱臣贼子，是大逆不道。历代思想家，很少有人敢对君权说个“不”字，即使是历代农民起义领袖，在君权神授观念的毒害下，也只反对暴君，而希望有“真命天子”出现，终未能突破这重铁网。而谭嗣同则勇敢地对专制皇权发起猛烈的冲击和批判，彻底揭穿了“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的谎言。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择民，而民择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侔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天下无有因末而累及本者，亦岂可因君而累及民哉？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臣也者，助办民事者也。赋税之取于民，所以为办民事之资也。如此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③谭嗣同在这里阐明了几个根本道理：一、君主制度的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有一定阶段的产物，不是自古就有的，更不是“神授”；二、君与民的关系，民是本，君是末，划分君民之初，君与民是十分相近的；三、君是为民办事的，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四、君既是民所共举为民办事的，如不能为民办事，则可共废之；五、征收赋税，是用来为天下办事的，不是供君主挥霍享乐，骄奢淫纵的。这样，所谓“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云云，一下子就被戳穿了，使君主专制制度发生了根本动摇。

从民本君末的理论出发，谭嗣同进一步揭露了君主专制的种种罪恶。他说，秦汉以后，由于推行“尊君卑臣，愚黔首”的政策，历代君主已失去原来由民共举、为民办事的意义，变成了欺压人民的独失民贼，变成了把天下据为己有的窃国大盗。这种“尊君”、“卑臣”，“愚民”的谬论是“大盗”的政治。从秦始皇开始的历代帝王，都是“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骄奢淫纵”，“供一身之不足，又欲为子孙万世之计，而一切酷烈钳制之法乃繁然兴矣！”“后世帝王喜其利己，遂因循而加厉。”^④对于一些腐儒逢迎君主所好，从旁帮腔，他也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指责，认为是“辅桀助纣”。谭说：荀子是吹捧君主制的领头羊，他“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后来，经过汉唐特别是宋代程朱理学的阐发，君主制遂进一步理论化。由是“平等亡，公理晦，而一切惨酷蒙蔽之祸，斯萌芽而浩瀚矣。”^⑤从此，是非黑白，完全被颠倒了。他认为君主和常人一样，都是两耳两目、双手双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上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这些腐儒完全不懂立君本意，“显背民贵君轻之理而谄一人，以犬马土芥乎天下。”^⑥因此，他愤怒地得出结论：二千余年之法，都是“暴秦的弊法，且几于无法”；“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⑦

最为可佩的是，他不但勇猛地批判了万恶的君主专制，而且对清朝的专制帝王也进行了无情的讨伐。他斥责满洲亲贵“凭陵乎蛮野凶杀之性气以窃中国。及既窃之，即以所从窃之法还制其主人。”他严厉谴责清军入关后到处屠杀掳掠，造成生产力大破坏。他说：“《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薙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莫不如是。”清军“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苟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兽横来吞噬。”他指责清帝南巡，“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⑧他声讨清朝统治者为了苟延残喘，“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致使国家“外患深矣，海军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⑨在这里，他把清朝统治者对内屠杀劫夺、对外卖

国投降及所造成的恶果,再清楚不过地展现在人们眼前。

纲常伦理是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是维护君主专制的精神支柱。它既是钳制广大群众的工具,又是制定刑律制度的依据。要冲决君主专制的网罗,就不能不批判其借以安身立命的纲常名教。在这方面,谭嗣同对纲常名教的批判,也是空前猛烈的。他认为,纲常名教是历代帝王用来钳制人民,巩固统治的工具,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他说,封建卫道者“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其实,“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历代帝王一向依靠威刑统治天下,“不得不广立名为钳制之器”。“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⑧以期全国在名教的束缚下,俯首帖耳听从君主的残暴统治。这就是历代帝王如此重视名教的终极目的。

名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在封建时代,一个人无辜被杀,尚有人怜悯;倘若成了名教罪人,则谁也不敢同情。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肯饿死,也要守寡保节。足见这把软刀子的狠毒。正如谭嗣同深刻指出的:“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术,故莫以繁其名为尚焉。……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历代君王“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⑨

在三纲五常中,君为臣纲是核心。谭嗣同指出:“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他认为君民是平等的,要臣民为君去效忠死节,是大悖情理的。“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镬刀锯,不以为怪,固已大可怪矣,而君之亡犹欲为之死节。……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一代一姓之兴亡,是微不足道的,与民众有何关系?“乃为死节者,或数万而不已也。本末倒置,宁有加于此者?……君为独夫民贼,而犹以忠事之,是辅桀也,是助纣也”。官吏充当了暴君奴役人民的帮凶,可耻可恶,“中国人犹以忠义相夸示,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矣!”他认为“止有死事的道理,决无死君的道理。”“古之所谓忠,以实之谓忠也。下之事上当以实,上之待下乃不当以实乎?则忠者,共辞也,交尽之道也,岂可专责之臣下乎?”^⑩

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忠君就是爱国。谭嗣同否定了这种观念,而把民与国联在一起。他指出民为邦本,“除民而外,国果何有!”^⑪因此,报国必须为民;把忠君视为爱国,是本末倒置,十分荒谬。从忠君爱国到报国为民,这在观念上是一个带根本性的转变。

在批判封建的忠君观念同时,谭也严肃批判了封建“孝”道。他认为孝和忠一样,都是为了钳制臣民的反抗制造的。“君父以责臣子,臣子亦可反之君父,于钳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等一切分别……忠孝既为臣子之专名,则终必不能以此反之。”他把平等观念移植到父子关系上,认为“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平等也”^⑫。

他猛烈抨击封建纲常对妇女的摧残,指出妇女在封建社会中,受到多方摧残与限制,身心极不自由。如被迫缠足,“残毁其肢体”,“锢妇女使之不出”,“严男女之际使不相见”,对妇女“隔绝之,若鬼物,若仇雠。”婚姻上妇女毫无自主之权,“本非两情相愿,而强合漠不相关之人縶之终身,以为夫妇”;妇女地位低下,纯属男人的玩物,“男则姬妾罗侍,纵淫无忌;女一淫即罪至死”。谭嗣同对这些丑恶现象深恶痛绝,大声疾呼:“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为无量之盛德大业”^⑬,理应一律平等。

在批判纲常名教之后,谭嗣同提出,新的道德标准要符合自然本性和人的本性,认为只有“仁——通——平等”才符合这个标准。从这种平等理论出发,他认为人与人是平等的,应

该用朋友关系取代封建伦理纲常。“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与国人交，君臣朋友也；不独父其父，不独子其子，父子朋友也；夫妇者，嗣为兄弟，可合可离，故孔氏不讳出妻，夫妇朋友也；至兄弟之为友于，更无论矣。”^⑥

通过对君主专制和旧思想的批判，谭嗣同提出“尽变西法”的主张。他对清政府不适时变法极为愤慨。他说“庚申（1860）可变矣，乙酉（1885）可变矣，而决不变。至乎今日，奄奄一息。”^⑦他指出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唯变法可以救之”，变法则“民智”、“民富”、“民强”、“民生”^⑧，“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⑨至于如何变？政治上，他主张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把建立议院作为改革政治的首要之举。同时改革官制，使官吏“无内外之重轻，无文武之区别，专其职业，少其累层，迁其勋阶，增其禄精”，“改订刑律，使中西合一”^⑩。经济上，他呼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认为传统的农本经济不能富国富民；主张资本家自由设厂、开矿，广泛使用机器生产；鼓吹“商战”，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和发展工商业的建议。文化上，主张“变学术”、“变衣冠”、“变风俗”。他要求废八股，变科举，讲求实学，广兴学校，“无一乡一村不有学校”^⑪，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谭嗣同的主张已经超出改革的范围，透露出革命倾向。如他说：“《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以时考之，华人固可以奋矣。’言外之意，华人反清的时机已经来临了。此外，如教人们对清朝统治者‘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莫若明目张胆代其改革，废其所谓君主而择其国之贤明者为之民主’。^⑫皆表露出反清革命倾向。

旧思想、旧传统是一种惰力，严重妨碍变法的推行，阻碍社会的前进。谭嗣同把这些旧东西统称为“网罗”，响亮地喊出了“冲决网罗”的口号。他对君主专制的猛烈抨击，对清朝帝王的尖锐批判，对纲常名教的鞭挞，对反清革命的鼓吹，不仅超过了前人，也超过了同时代的康有为等人。梁启超评论说：“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劫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⑬钱穆也说，谭嗣同的言论，“较之戴东原所谓宋儒言理以意见杀人者，愤激犹过之。近世以来，学术思想之路益狭，而纲常名教之缚益严，然未有敢正面对而施呵斥者，有之自复生始也。”^⑭自然，谭氏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如他对君主专制的形成和发展，其分析是不全面的，未能从阶级斗争角度作出科学的解释。他虽猛烈抨击了荀子以后的儒学，对孔子却不敢触动，甚至把孔子视为革新的圣人，自己则想做孔教的马丁·路德。这些是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决定的，当然不宜苛求。

二、维新变法的坚强勇士

戊戌维新中，谭嗣同不但对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和传统进行了空前猛烈的批判，成为冲破封建网罗的闯将，而且身体力行，扎扎实实地推行变法维新，成为变法维新的一名勇士。

还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初，他愤于清军节节败退，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就勇敢地提出各种变法图强主张。1895年春，他听到清军惨败，再次上书他的老师欧阳中鹄，表示“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他认为，要变法，首先要团结志士，作育人才。因而，他首先在浏阳设立一个学会，预备“先小试于一县，邀集绅士讲明今日之时势与救败之道”^⑮，争取他们的支持；又设立算学格致馆，招集聪颖子弟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开创了湖南讲求新学的新

风气,这是日后湖南成立南学会、开办时务学堂、算艺学堂等的嚆矢。

1896年春,谭嗣同随父继洵到北京,不久奉父命以同知入资为候补知府,于6月底到达南京,此后在南京候补一年。但他对补官毫无兴趣,而是往返于宁沪之间,废寝忘食地和梁启超等开展变法活动。他十分关心上海的《时务报》,对该报的宗旨、编辑方针都提出过具体意见,还为报纸组织了大量稿件,使报纸办得有声有色,“一时风靡海内,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⑧,为宣传维新变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在此其间,他还倡导妇女解放,和梁启超等人于1897年6月在上海设立不缠足会,提倡放足。他还把反对缠足和兴办女学结合起来,支持经元善创办中国女学堂,帮助夫人李闰联合妇女界创立了中国女学会。这些移风易俗措施,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礼俗,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妇女的思想解放。在南京,他联合杨文会等人于1897年5月创立金陵测量会,并准备创办《矿学报》,大力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对提高人们的科学水平和推动变法维新,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强划山东为势力范围,引发了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谭嗣同目睹此情此景,悲恸万分地呐喊:“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⑨于是,他应陈宝箴之邀,毅然弃官回到湖南,和江标、熊希龄等团结一心,筹办新政。他和陈宝箴等设立时务学堂于长沙,曾亲赴上海聘请梁启超任总教习,李维格教西学,自己和唐才常等任分教,大力向学生灌输民权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把时务学堂办成湖南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培养出一批矢志改革的有为青年。

12月,谭与熊希龄、唐才常等设立湘报馆,于第二年3月7日发行《湘报》,每日一刊,“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⑩。这是湖南最早的日报。对批判旧文化、宣传维新变法、培育人才均起了重大作用。梁启超曾评论说,《湘报》发行虽然不到一年即被封闭,“然湖南人自此昭苏,后此奇才蔚起,以缔造我中华民国,《湘报》之赐也。”^⑪

为了从组织上推动湖南维新运动,谭嗣同于1898年2月在长沙建立南学会。他把南学会视为湖南新政的“命脉”,亲自制订学会章程,选聘合格的讲学人员,并在各府厅州县设立分会,使湖南新政通过学会推及全省各地。南学会从2月21日开讲,分别讲演学术、政教、天文、舆地。每次开讲,听讲者达一千多人。主讲者痛陈中外大势,呼吁救亡图强,对听讲者有莫大启发作用,还将讲义在《湘报》发表,借以扩大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湖南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使顽固官绅王先谦、叶德辉等恐惧万分。他们像疯子一样对维新派进行谩骂攻击,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谭嗣同等无所畏惧,仍坚持斗争,“不能曲学而阿世”,“不胜则以命继之”^⑫。尽管不久维新运动转入低潮,而“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士,遍地皆是。……自此以往,虽守旧者日事遏抑,然而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之士之志不可夺矣。”^⑬

此外,谭还在湖南积极筹办实业,认为只有发展实业才能救亡图存。他提倡商民开矿办厂,扩大湖南对外贸易,倡议筹款修建湘粤铁路,还亲自举办了内河小轮船航运公司,筹建湖南焙茶公司,为湖南实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的推动下,湖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人思自奋,家议维新,……风气之开,几为各省之冠”^⑭。他本人也显示出卓越才能,礼部侍郎徐致靖赞扬他“天才卓犖,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⑮,特推荐赴京参预全国新政。

1898年6月30日,光绪帝命谭嗣同进京。谭因病滞留武昌。7月30日,光绪帝再次谕

令即日进京，谭只得带病前往。9月5日，光绪帝授予谭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新政，“凡有奏折，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④这时，新旧两党斗争日趋激化。在西太后准备废弃光绪帝的紧急关头，他挺身而出，夜访袁世凯，寻求挽救之法。9月21日，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囚于瀛台，西太后“垂帘听政”，谭嗣同随时有被捕危险。可他考虑的不是自身安危，而是设法营救光绪帝。在一切努力失败之后，他劝走梁启超，自己却不顾朋友的劝告，坚决拒绝出走，并严正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⑤被捕以后，他在监狱中仍然镇静如常，在壁上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绝唱。刑场上，他神色不变，悲壮地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⑥表现出一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不愧为一位为变法维新、救国救民而献出一切的坚强战士。

三、谭嗣同精神永放光芒

谭嗣同生活在由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核，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又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使他的思想既具有弘扬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又具有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性。他继承了“民贵君轻”的儒家优秀文化，结合西方的自由平等学说，空前猛烈地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他把传统的忧患意识与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结合起来，努力学习西方，矢志不移地实行维新变法；他发扬儒家“舍生取义”的浩然正气，墨家仗义任侠的豪侠作风，兼采佛家“不生不灭”的生死观念，置个人利害生死于度外，为变法英勇献身。这就是谭嗣同精神，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谭嗣同为变法维新而英勇牺牲了，但他的热血并没有白流。他的影响生生不息，一代又一代地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勇前进。顽固派可以砍下谭嗣同的头颅，却永远无法扼杀谭嗣同的精神。诚如当时一篇文章中所言：“败不忧，成不喜，复维新，誓不止。六君子头颅血未干，四万万人心心不死。”^⑦《字林西报》也评论说：“中国所需要的是青年的血液，而我们在康有为和他的死义的诸同僚的例子中，看到这种旺盛的精神是充沛的，我们引以为慰。唯一的遗憾是，这些人竟牺牲在一个非正义的反对势力的酷刑之下，但我们可以断言，这些人的精神是继续存在很多人中间的。改革一日不完成，他们一日不会休止。”^⑧

谭嗣同的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在他的精神激励下，许多爱国志士开始向反清革命方向转化。他的挚友唐才常，决心将“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神州”^⑨，林圭发誓：“中国流血自谭君死，我承其后矣！”^⑩他们纷纷联络会党，组织团体，策划武装起义。1900年唐才常领导了自立军起义，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倍受谭嗣同精神的鼓舞。黄兴看到“戊戌、庚子两次的失败，更加坚定了根本推翻清朝政府的意志，决心从事排满革命。”^⑪《革命军》作者邹容，将谭嗣同的遗像置于座右，并题诗一首：“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⑫，激励自己去完成谭氏未竟之业。陈天华在《猛回头》中赞扬他是“轰轰烈烈为国流血的大豪杰”。吴樾、禹之谟等人为反清革命英勇牺牲，都曾深受谭嗣同精神的影响。谭嗣同精神成了革命志士的精神食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少革命人物同样受到谭嗣同精神的影响。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曾

多次谈到谭嗣同,对他深表敬佩。他说:“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刊《湘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①又说:“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戌之秋,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②毛的好友张昆弟也说:“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③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组织新民学会,也号召会员以谭嗣同“冲决网罗”的精神去“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④。

谭嗣同的精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敢于革新、勇于实践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理应继承和发扬。可是,近年居然有人提出非议,说什么“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思潮的源头”。言外之意,谭的这种精神贻害很大,不值得肯定。为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谭嗣同不该冲破封建网罗吗?难道谭氏努力变法不应该吗?为了激励后人,谭氏为变法流血也错了吗?如果谭嗣同这些宝贵精神都否定了,那么,中华民族还有什么精神值得继承和发扬呢?丢掉了敢于革新、勇于实践的精神,社会怎么进步呢?这是值得三思的。

注 释:

-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 1954年版,第 69页。
- ②③⑥⑦⑧⑨⑩⑪⑫ 谭嗣同:《仁学》,载《谭嗣同全集》(下),中华书局 1981年版(以下简称《全集》),第 290 339 337 336 337 337- 338 342 341 342 343 299 348 337 339- 340页。
- ④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十),载《全集》,第 463 462页。
- ⑤ 谭嗣同:《治事篇第五·平权》,载《全集》,第 439页。
- ⑬⑭⑮⑯⑰⑱ 谭嗣同:《仁学》,载《全集》,第 341 299 348 303- 304 350- 351 343- 349页。
- ⑲⑳㉑ 谭嗣同:《上欧阳中鹄书》,载《全集》,第 157 161 168 165页。
- ㉒㉓ 谭嗣同:《报贝元征》,载《全集》,第 210- 213 212页。
- ㉔㉕ 梁启超:《清议报第一面册祝词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载《清议报全编》第 1册。
- ㉖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台)商务印书馆 1957年版,第 667- 668页。
- ㉗ 谭嗣同:《有感一首》,载《全集》,第 540页。
- ㉘ 熊希龄:《湘报馆章程》,《湘报》第 27 28号。
- ㉙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 75,中华书局 1932年版,第 3页。
- ㉚ 参见《唐才常集》,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 238页。
- ㉛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 1954年版,第 107 143页。
- ㉜㉝ 谭嗣同:《与徐仁铸书》,载《全集》,第 269 287页。
- ㉞ 徐致靖:《保荐人才折》,载《戊戌变法》丛刊第 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年版,第 336页。
- ㉟㊱㊲ 杨廷福:《谭嗣同年谱》,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 112 117 119页。
- ㊳ 西樵子:《心不死》,载《清议报》第 4册。
- ㊴ 《字林西报周刊》,《戊戌变法》丛刊第 3册,第 493页。
- ㊵ 《自立会人物考》,《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 2期。
- ㊶ 周震麟:《关于黄兴、华兴会和辛亥革命后的孙黄关系》,《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 331- 332页。
- ㊷ 章炳麟:《邹容传》,载台北国父百年诞辰筹委会主编《革命先烈先进传》,1965年版,第 25页。
- ㊸㊹㊺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 1990年版,第 362 514 639页。
- ㊻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版,第 15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